



■安徽黟县宏村

中坤的“世界版图”

当日进京招商引资的老县长肯定没有想到，旅游开发会给整个黟县带来如此巨大的变化。现在的黟县想必是要在旅游产业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了，因为在中国，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地方，能把整个县的风貌保持得如此统一——清一色的徽派建筑，无论新开发的楼盘，还是政府机构，或者是马路边一闪而过的民居，无一例外的白墙黑瓦，在南方葱绿如烟的山水间，看起来格外的赏心悦目。

而黄怒波也不会想到，中坤在黟县会把根扎得这么深，把网撒得这么大。

除了宏村之外，中坤还拿到了南屏和关麓2个村的旅游经营权。南屏村还有个说法是“中国影视基地”，村子里除了古民居之外，更有2个建筑宏伟、保存完好的祠堂。叶氏宗祠是当年张艺谋拍摄《菊豆》时候的取景地，如今祠堂的门上还挂着“老杨家染坊”的牌匾，天井里还高高地挑着几匹已经褪色的布。一墙之隔的叶氏支祠则是李安拍摄《卧虎藏龙》的取景地，在这个长满青苔的天井里，杨紫琼和章子怡曾经上演过一场精彩绝伦的对战。

黄山宏村只是中坤旅游地产的第一个项目，经营十多年还在不断寻找新的开发模

式。而黄怒波在旅游地产板块上踏出去的这一只脚，却越伸越长。

现在，黄怒波经常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把用在旅游开发上的精力都用在拿地上，那该能赚多少钱？”宏村一年的门票收入有几千万，这个数字在旅游业看起来不少，而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却少得不值一提。

黄怒波有他自己的打算。连焦青都说，宏村项目刚启动的时候，大家都看不懂，看不出能挣钱的地方，后来想想，大概是自己的文化底蕴没跟上，所以站不高，看不远。

如今，中坤的旅游度假板块已经成型，国内的5个项目，加上日本北海道的度假村项目，以及美国洛杉矶的shopping mall和牧场，黄怒波拥有了他自己的世界版图。

诗人巨贾

在解读黄怒波的生意经的时候，不能忽视的一点是，黄怒波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相当优秀的诗人，他以骆英这个笔名，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在当下，诗歌空气稀薄，心灵普遍粗糙，一个在福布斯排行榜上占据一席之地的地产商是一个诗人，也算得上是一个时代风景。

写诗的人，自然格外敏感，能体会常人所不能见之处，也会有常人所不能理解之举动。黄怒波说，宏村不是会下金蛋的母鸡，只是一头能挤奶的奶牛，而等待这头奶牛进入盛产期，他足足耐了5年的寂寞——或许在那5年里，能让他聊以自慰的就是：“中坤拥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世界上还有哪个公司能办到？”

黄怒波是地产商人，他不会放弃能下金蛋的母鸡，所以，住宅项目和商业地产项目还在做，甚至焦青还会把北京大钟寺中坤广场项目和大兴商业项目称作最重要的项目，“只要把这2个项目做好了，就什么都不怕了。”

同时，黄怒波是一个文化商人，他抢占着更为稀缺的古文化、古村落资源，甚至不惜用地产项目赚到的钱来补贴旅游板块。在他的眼里，这一部分才是长线的投资，能带来更为持久和健康的发展——不会留下丑陋的建筑物，却能弘扬、回归“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用现在流行的话说，是低碳和环保的生活方式。 **MCB**



陈志武

- 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中国金融博物馆首席顾问。
- 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威斯康辛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美国耶鲁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任教，并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著名学术机构聘为特聘教授或访问教授。
- 世界金融学和金融资产定价领域最具有创造力和最活跃的学者之一。

陈志武： 金融市场改变了百姓生活 ——《财富生活》专访经济学家陈志武

文_本刊记者 郭婷婷 责任编辑_郭婷婷

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意识到，但在过去的20年—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从调查数据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

CHEN ZHIWU: LIFE IS CHANGED BY THE FINANCIAL MARKET

本世纪初，一项颇得业内人士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全球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一位来自中国、生于湖南的男士榜上有名且位居前列，他就是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陈志武。

陈志武教授长期以来不断探索金融市场的发展史，包括金融如何影响社会变迁、文化变迁；金融市场需要什么制度环境；中国证券类金融为什么历来不发达；现代资本市场如何在中国扎根；各国证券市场的内在机理等等。“中国经济与社会的未来趋势如何、转变经济模式的改革动力源自何处等，这些都是我最近比较关注的领域和话题。”



投入一辈子做喜欢做的事

出生在中国一个普通的家庭，励精图治成为耶鲁大学优秀学子，现今又是中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之一，在人生的诸多经历当中，陈志武最难忘、最留恋的还是小时候在湖南农村生活的经历以及在中南大学读书的经历。“那些时候是我一辈子当中经济状况最差、最没有钱花的时候，但却是最有意义、对我影响最大的岁月。或许是那時候的无忧无虑，或许是那時候的纯真友情，使整个经历不一样。” 言语间难掩留恋之情。

谈起父母对自己成长的影响，陈志武再一次陷入回忆中：“我父亲是个话不多的人，教育我们的方式不是用口说，而是通过他自己做，由我们去观察掌握。” 在陈志武14岁时，一次跟父亲和一位邻居去40公里外的山上扛木料，一根就是六七十公斤。那么远的路程，肩扛那么重的木柱子，全程靠脚走，走得饥寒交迫。沿途都是父亲先往前跑，把树干放下后，再回头来接他。在陈志武的眼里，人的生活就是这么有意思，“当你吃不饱的时候，每天忙着就是为了能吃饱，就想：如果哪天我能吃饱了、不用为温饱担忧了，那就最幸福了！可是，一旦真的解决了温饱问题，你又会想：如果能把明天和后夭、把子孙后代的温饱问题都解决好，那就最幸福了！当然，等那一天真的到来了，你又想追求新的目标，下一目标也许是成为千万富翁，然后再是亿万富翁，等等。”

不过，到一定时候，财富也好、物质收入也好，对于大家来说，会只是一些数字了，会越来越没有意义。在陈志武看来，财富远非生命的全部，“我周围的很多朋友，虽然他们拥有巨额财富，却依然无法改变越来越空虚的生活，如今很难有让他们激动的事情了。他们都很羡慕我，虽然我财富不多，可是，我至今对研究那么着迷，能够对世界的任何一个方面有新的认识，并因这新的认知而得到非物质的享受。” 他向记者举例，耶鲁大学的许多老师都是这样，为了追求获得新知的感受，宁可放弃高收入的机会。

如今，已经身为人父的陈志武对于子女的教育倾注了很多心血，“让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不要在乎别人怎么看。人的一辈子很短暫，不能整天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了让别人高兴、让其他人满意，到头来却把自己的一辈子给忘了。” 他指出，一般人总喜欢说“不要为自己，要为别人、为集体”，但是，仔细想想，如果每个人都在忙着为别人，没办法把自己料理好，那不是把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包袱吗？自己怎么有资格帮助社会、帮助别人？“所以，自己首先要有担当、负起自己的责任，做自己喜欢的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社会的整体幸福才会高，有能力帮别人的人才会多。”

对于未来，陈志武显得十分低调，再次展现了一个学者的本分，“继续做自己喜欢的研究，包括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过去的变迁史。” 他希望对这些领域能够有所贡献。“这是需要投入一辈子的事业，也是我自己最喜欢做的事。”

将低劳力成本优势留在过去

富士康跳楼事件成为近期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也成为百姓热议的话题。随后，富士康公司立即作出回应并于2010年6月两次提高深圳地区生产线员工的薪资，调节幅度由每月1200元上升至2000元，涨幅达66%。

与富士康事件同时，南海本田员工也集体停工要求涨工资，几经周折，最终本田公司在一份传真声明中承诺，工人的月工资将增长24%，达到每月1910元，大部分工人已经接受了这一提议。

“看到因工人罢工、跳楼事件引发的涨工资，一些学者朋友就认为，让自由工会或其他自发组织代表工人‘集体协商’工资与其他福利，这从根本上威胁到了低劳动成本优势。意思是，一旦中国的低劳动成本优势没有了，经济发展就要受挫。显然，这种担忧是站不住脚的。” 陈志武一直以来对此问题有深入的研究，“首先，低劳动成本是过去和今天的现状，是暂时可以利用的‘优势’，但不应该像我们谈论中国文化传统一样永久保护下去。经济发展的目的不是为了留住低劳动成本‘优势’，恰恰相反，应该尽早终结这种状况。低劳动力成本不是个值得守卫的‘优势’，因为它意味着百姓总体收入低，意味着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

“我当然不是在谈空中楼阁，不是在列出一张‘愿望’单。” 陈志武提醒道，今时不同往日，“如果说30年前，在中国社会经历了计划经济时期之后，普遍贫穷、物料短缺是当时的现实，在那种谋生存的被动局面下，利用低劳动工资的相对竞争优势来快速发展经济，其逻辑合理性自不用说。所以，邓小平同志以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发挥低劳动成本优势的发展潜力，明智之举也！”

随后，陈志武给出了更具体的分析：改革开放之初，劳动力成本优势基于两个前提——物资严重短缺和劳动者权利低。中国人口众多，所以物资短缺威胁到生存，在活下去的生存需要是社会的第一追求时，收入要求自然很低，工资也不可能高，劳动者对权利的要求也会很低，因为生存权优先于体面权。因此，那一时期，低劳动成本优势可以理解。

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越来越高，为生存而生产的必要性逐渐降低，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物质产能越来越过剩，对出口市场的依赖快速上升。按照其他国家的经历，这时候，低劳动成本优势应该逐渐下降，让劳动收入跟着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可是，在之前尝到低劳动成本优势带来的增长甜头之后，大部分企业当然希望继续维持下去。

最近几年，制造业基地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企业雇工时的谈判地位越来越高，单个工人的议价空间越来越小。

这在陈志武看来，其副作用很多。一是，国内民间消费增长慢，“逼着经济模式更多依赖投资和出口”；二是，劳动成本长期低下，消

除了企业追求新技术的动力，因为用低成本的工人就能做的，企业自然不会花钱做技术革新；三是，低劳动成本优势持续过久，会把全球制造产生的污染往中国集中得过多。最后他主张，“我们应该让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留在过去，建立新的优势去参与竞争”。



金融市场改变了百姓生活

谈及如今金融市场对百姓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陈志武不无感慨：“从学习经济开始，我便常常问自己：中国有了保险、抵押贷款、股票、基金等金融市场后，社会到底有了什么变化？金融究竟是如何影响社会的？我出生在湖南一个美丽的乡村，当我从事了经济研究之后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正被市场化改变的社会，一个在方方面面都在转变的国家。”

“我在这方面进行研究和写作已有几年，我计划着写一本书，探讨金融发展和一般市场发展对文化和社会带来的影响。我一直在搜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数据，以此理解人们的文化价值观——特别是对家庭、婚姻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他们是如何随着金融和市场而变化的。” 对于自己的研究课题，陈志武仍旧像一个刚刚步入大学意气风发的学生，显得十分兴奋。

“比如，我和几位研究生做了两个问卷调查，第一次是两年前，今年夏天又做了一次。当问及被调查者‘你为什么要孩子’，我们发现，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答案选择上差别最明显：在农村，大约70%的人是基于经济原因，为了‘养子防老’；而在北京，这一比例仅有15%。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更可能因为情感上而非经济上的原因选择生小孩。” 除了城市与农村的差异，第二个决定因素是一个人是否已经购买保险或者使用了任何一种市场提供的避險养老金融工具，买了保险或养老产品、投资基金的人更可能会说“生小孩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养子防老”。

“家庭收入的高低对生小孩的目的和态度并没有太大影响，反倒是是否持有现代金融产品更有决定作用，这让我们感到十分意外。” 陈志武坦言，“可见，市场的改变推动了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同时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刺激对金融市场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正是这样——从

20世纪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把各地区间的市场整合在一起，包括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没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当然，收入也在增加，人们的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20世纪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的好处，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陈志武再次强调他的观点，“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清楚意识到，但在过去的20年—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 而从他提供的调查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出，北京、上海等城市居民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虽然很多人还没察觉到这一点。

当你观察上海、北京等大城市里父母亲与孩子交流时，你会发现，方式越来越趋近于美国家庭，即父亲通常不会试图在孩子面前摆出一副威严、不可亲近的样子，已经不是一种从上至下的、单向的、命令式的姿态，相反，更多父母选择以一种非常平等的方式与他们的孩子沟通，试图进行一种心对心的交流。

“在我看来，当父母不再把孩子当作他们的养老保障或投资载体时，他们没有必要担心在孩子身上的投资怎样才会有回报？’也就没必要迫使孩子时时听话。这些父母为自己买好保险品、退休品、养老基金等等，此后，从经济上，他们就没有依靠儿女的必要。这样，跟孩子的关系主要集中在感情交流上，希望跟儿女在情感上靠得很近。但是，他们也同样意识到，如果希望孩子在情感上和自己靠得很近，就不能逼迫他们听话，而是更倾向于平等谈话。”



中国30年成功，历史不可复制

过去的30年，中国的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然而，盛世之下，陈志武表示，中国过去30年成功的模式对未来30年是否适合，还需要探讨和论证，历史不可复制，仍然需要坚持深化市场改革和体制改革。

过去在中国需要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时期，由国家拥有企业、资产和土地能更方便地调配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短短的30年里，通过多方面的投资，建立了强大的工业基础、高速公路网、众多大小城市，让中国成为世界制造基地，成就卓著。但是，到今天这个时期，中国的工业产能、运输容量都已经很大，而且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

他进一步解释，“也就是说，既有的经济体系在过去30年的正面贡献不少，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如果继续偏爱投资，继续朝扩大生产投资之路走下去，将使产能过剩加重。而与此同时，老百姓消费增长所需要的收入基础会越来越弱，消费需求越来越不足跟产能供给不断上升合在一起，就可能使经济面临困境。”

面对所提出的问题，陈志武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最好的办法是，在这个时候将部分国有资产进行私有化改革，把‘全民所有制’的所有者具体细化、落实到13亿公民的身上，让老百姓直接变成资产所有者，并且通过公司治理的改革，改变现在把过多资金用于扩大投资的局面。一旦通过私有化改革让老百姓得到真正的财产性收入，民间消费的增长就有了更多的收入基础，中国经济未来增长就可以更多依赖国内民间消费、更少依赖出口和投资。”

租房并非下策

当谈及当今房地产市场以及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政策时，陈志武非常坚定地表示，租房在当下是较优的选择。

“房价太高，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房价泡沫很明显。价格应该下来，但相比通过行政手段来压低需求，更好的是把小产权房合法化，让农村集体也能供地、供房，让土地供应增加。房子供给增加了，房价就会下来。调高利率是更合理的抑制需求办法。近期，由于政策的不确定性，许多人会继续观望，这也会使房价下跌。”

以前，我们中国人说“量入为出”时，“入”只是过去和现在的收入，就是说不能花掉手中之外的钱。但是，现在有了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学生贷款等金融产品的支持后，未来收入跟现在收入之间的距离就被缩短了，差别变小了，“所以，你可以把部分未来收入‘借到’今天花。”陈志武形象地向记者解释道，“今天就买房子、买车，这样，只要你借来花的总量没有超出未来收入和今天存款的总和，你就没有违背‘量入为出’的原则。适当借钱花是好事，也能促成长自立。”

那么，借贷的上限是多少呢？

“举个例子，如果你今年30岁，已结婚或者还没结婚但将来要结，假如你很自立有出息，不希望再靠父母供养，那么，大致上你还有30年的工作收入，考虑到今后的医疗、子女供养、自身养老等等，建议你今天能借贷的上限最好不要超过年收入的10倍，并且绝对不能超过年收入的20倍。”也就是说，如果你现在的年收入是10万元，你的工资每年与GDP保持同速增长，同时你妻子或丈夫的收入用于今后的生活开支等，那么，你们能承担的借贷数额最好不要超过100万，且绝对不能超过200万元。“如果你要通过按揭买房，无论如何，房价不能超过你年收入的20倍，最合理的是低于10倍。” MCE

传统新奢华

与高尔夫等纯粹的休闲方式相比，收藏老爷车不仅同样具有放松身心和社交的功能，还蕴藏着获得投资回报的可能。而与玩股票基金等传统投资相比，老爷车收藏者不仅不用时刻关注价格的涨落，还能在娱乐身心的同时，坐享投资升值所带来的满足感。

THE HISTORICAL DEFINITION OF CARS

以历史定义汽车的意义

文、图_赵昂 责任编辑_王婷婷

美国老牌的老爷车拍卖公司巴莱特·杰克逊近3年来的老爷车交易额以平均62.74%的速度增长，至2006年已接近1亿美元。在第36届收藏车拍卖会上，1271辆车的总拍卖价格达到了1.12亿美元，平均每辆车的价格接近9万美元。



■ BMW 303

一个世纪,对于个人而言也许就是一生的光阴;而对于一个汽车品牌来说,可能只是一个“童年”……

当我们被纷至沓来的新车型迷住了双眼时,可曾想到在一个多世纪之前, Gottlieb Daimler (戈特利布·戴姆勒)和Karl Benz (卡尔·奔驰)是怎样把人类带进了“汽车时代”。老爷车可以说是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它们穿越时间的长河来到我们面前,带着历史的尘埃,古朴抑或华贵,在车轮的转动中,再现那段创造的岁月。



■第一辆奔驰车

聆听“田园交响”——馥郁浓香的德国老爷车

印象中,德国车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做工精湛、造型低调而又不失严谨。的确,作为现代汽车的发祥地,德国的汽车生产都是高度专业化和集团化,就连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也是如此。并且非常注重新技术的研发和测试。

代表老爷车: Benz三轮汽车、Daimler Phoenix、BMW303、Maybach W1、Maybach Zeppelin DS等等。

1885年9月5日, Karl Benz (卡尔·奔驰)研制了三轮汽油机汽车,并于1886年1月29日向德意志帝国专利局申请汽车发明专利。次年, Gottlieb Daimler (戈特利布·戴姆勒)试驾了自己制造的Daimler Phoenix (戴姆勒—凤凰)四轮汽车。此二人就是被世界公认的“现代汽车之父”。我们津津乐道的奔驰和戴姆勒就是从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一路走来的。

有奔驰的地方就一定有宝马,作为第一辆真正意义上的宝马汽车——BMW303也是在战火中挣扎前行。自从1917年7月21日,巴伐利亚发动机有限公司即宝马公司(BMW)诞生以来,便开始研制汽车。虽然1929年1月,DiXi挂着宝马车标下线了,但它的本来面目却是从英国引进的奥斯汀7型轿车,只是重新设计了车身而已。直到1933年2月11日,第一辆真正意义的宝马汽车——BMW303才诞生。“双肾”型的进气格栅也是从那一刻起成为了宝马汽车的标志性“脸谱”。

在德国,还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字——Maybach (迈巴赫)。Wilhelm Maybach (威廉姆·迈巴赫)和Karl Maybach (卡尔·迈巴赫)这对“父子兵”缔造了能和劳斯莱斯、宾利抗衡的贵族品牌。1921年,第一辆豪华轿车Maybach W1问世,“迈巴赫”三个字从此名声大噪。1930年,Maybach Zeppelin面世。在当时,排量8L,并采用V12发动机的豪华车并不多见,200马力的动力输出也让它傲视豪华车领域。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弥漫着艺术氛围的德国,你是否也在老爷车身上感受到了贝多芬和巴赫的古典气质呢?



■Daimler Phoenix



■BMW 303



■Maybach Zeppelin DS

亚平宁“浪子”——布加迪老爷车

提到这个与法拉利、兰博基尼齐名的意大利跑车品牌,相信大家一定不会陌生。1900年,公司创始人Ettore Bugatti (埃多尔·布加迪)设计完成了第一辆布加迪汽车。并于1909年,建立了自己的公司。专门生产赛车和高级轿车,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1929年生产的皇家T41型豪华轿车。该车曾被拍出984.5万美元的天价。

布加迪品牌处处体现了意大利汽车的血统——速度、激情、浪漫、华贵。

迈巴赫车标中两个“M”:

品牌创建伊始,两个“M”是“Maybach Motorenbau”的缩写。而今两个“M”是“Maybach Manufaktur”的缩写。

TIPS:



■福特T型车



■第一辆东风—红旗



■第一辆红旗检阅车

炫富主义——美利坚经典老爷车

提到美国车,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个品牌可谓家喻户晓。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是谁让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是谁代表了美国车的雍容典雅?就不得不提到福特T型车和Cadillac (凯迪拉克)了。

被誉为美国“汽车大王”的Henry Ford (亨利·福特),在建立了自己的汽车公司之后,一直想生产一款人人都买的起的汽车,于是,在1908年10月1日,福特T型车应运而生。其第一年的产量就达到了10660辆。值得一提的是,世界上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也来自福特,这项技术使汽车的生产速度有了质的飞跃。

1902年,最初的凯迪拉克A型车的诞生拉开了一个豪华品牌的生产序幕。在品牌的创立过程中, Henry M. Leland (亨利·利兰)功不可没。凯迪拉克一直致力于生产豪华高档轿车,旗下车型也担当着美国总统座驾的光荣使命。

红旗飘飘——老爷车的中国情结

聚焦国内,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国产车的“孩提时代”。

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CA10卡车,翻开了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一页。有趣的是,第一辆红旗轿车的前身也借用了“东风”这个名字。1958年的5月12日,“东风—红旗”正式下线,车型编号CA71。当时的车标还不是一面红旗,而是一条金龙。直到1958年的8月3日,才是红旗轿车真正诞生的日子。

作为一款阅兵专用车,红旗轿车一直承载着我国领导人对中国汽车事业的美好期望。

我们只是粗略鉴赏了几款老爷车的迥异之处,而这背后的深层因素,则是不同国度间文化理念和社会背景的差异。老爷车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时代,更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我们自己的汽车工业也需要文化的衬托,需要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创造。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创造”必将屹立于世界车坛! **MCE**

WE CAN'T
BE YOUNG
FOREVER

我们都会老

从成年社会走到老龄化社会，美国用了69年，澳大利亚用了72年，瑞典用了85年，法国几乎用了120年。相比之下，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太快了。“2030年到2050年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这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的一段话，它向我们敲响警钟：银发浪潮已经袭来。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后果

文_张车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责任编辑_郭婷婷

人口不断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抗拒这样一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老龄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曾经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使中国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内，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才能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低生育率时期，人口增长速度大大减缓，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连续多年低于1%。与此相对应，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1950年，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重为22%，到现在已降至21%左右。中国人口增长占世界人口增长总量的比例，已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19.3%下降到目前的15%左右。

人口的快速转变的结果是中国不得不面对不断加速的人口老龄化。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着世界上规模最大，同时也是速度最快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历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接近7.0%，2002年底则为8.2%。可以说，中国已经跨入了老龄化国家的行列。预计到2017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从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程度来看，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国家，但老龄化的速度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最快的，而且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也将成为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学后果主要体现在其对劳动供给趋势的影响上。中国过去20多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与人口快速转变所形成的一个劳动力年龄人口相对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密切相关。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速，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将

发生根本变化。建立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如果生育率维持在1.8左右，则中国劳动力人口的增长趋势还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从15岁—64岁劳动力人口来看，2001年—2005年，每年增长数量都超过1000万，这一年龄段人口数量增加的趋势将持续到2014年。从15岁—60岁人口来看，这一年龄段的劳动力人口净增长趋势只能维持到2011年。从绝对数量来看，15岁—64岁人口会在2014年达到9.97亿的峰值，而15岁—59岁则会在2011年到其峰值，其人口规模为9.27亿人。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一段时间，之后，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

总体人口变动趋势意味着，劳动年龄人口会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此后将面临着

劳动年龄人口的净减少。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完全不同于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依赖于城镇化的进程。只要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不结束，城镇劳动年龄人口增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但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总量的逐步减少，城镇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减缓。总体来看，虽然在今后几年城镇劳动年龄增加的数量会有所减少，但总的来看，在2020年之前，城镇劳动年龄一直会保持较大的增长压力。只要保持足够快的城镇化发展速度，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趋势的减缓并不会在短期内使城镇地区面临着劳动力数量的短缺。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将长期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从而使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相适应就意味着

平均预期寿命

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预期寿命大约在48岁左右。20世纪80年代前期，预期寿命上升到66岁左右，1990年，预期寿命为69岁，2000年，预期寿命为71岁左右。

从纵向的角度看，我们注意到1950年—1982年，中国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17岁左右，平均年增0.53岁。而1982年—1990年8年间，预期寿命增长了3岁，平均年增0.38岁。1990年—2000年，预期寿命平均年增量下降到0.30岁。很显然，随着平均寿命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年平均增量在逐渐减少。

从世界看，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46.5岁，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66.1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41岁；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59.5岁，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3.1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57.3岁；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为65岁，其中发达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74.9岁，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为63岁。中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不但一直高于发展中国家，而且高于世界人口预期寿命。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大概要高出世界平均寿命4岁左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还偏低，但差距正在缩小。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和发达国家要差18岁，20世纪—80年代差距为8岁左右，现在大概为5岁左右。

TIPS:

着就业机会的增加和失业率的降低。因此，在面临着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如何造就更多的合格劳动者，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从而扩大劳动的有效供给，并因而成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之一。

人口不断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抗拒这样一个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老龄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法应对老龄化带来的挑战。中国能否成功地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决定于是否能对这样两个问题给予肯定的回答。一是中国经济能否继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二是中国能否建立起社会化的养老保障体系。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行驶在一个快车道上，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因此，中国能否应对

人口老龄化挑战将主要取决于对第二个问题的回答。

中国目前正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最为丰富的时期，劳动力资源优势是中国最大的竞争优势，而且，这种优势在中国成为WTO正式成员后变得更加明显。可以预见，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有可能会使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制造业中心，从而让中国的劳动力资源通过物化为产品的形式实现国际上的“流动”，为中国经济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应该说，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快速发展为中国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养老保障体制的改革进程也将加快，中国完全有能力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间不断完善养老保障体制，从而确保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都得到保障。 MCE

世界养老模式的发展轨迹

文_王桂新 [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责任编辑_郭婷婷

从世界范围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是在家中安度晚年；日本的调查也表明在福利（养老）设施中养老的老年人因心情忧郁而死亡的比率高于居家老人。考虑“居家养老”的某些局限，所以还要坚持依托社区，以社区服务为保障，把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居家养老的延伸和依托，建立“居家—社区”一体化的养老服务系统。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养老的内涵与养老模式也在不断变化。考察世界上养老模式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在人口转变及由于新生婴儿数量减少，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导致劳动人口日益减少出现的“少子高龄化”现象尚不明显，养老还没有被作为“问题”提出之前，世界各国的养老模式都普遍是“居家养老”；在“未老先富”的一些发达国家，由于经济发展已达到较高水平，在实行居家养老的同时，国家也大量投资兴办各种养老机构，

推动“社会养老”模式的兴起。

但随着人类社会逐步走向少子高龄社会，特别像日本、北欧等一些发达国家甚至已进入以少儿人口减少为主的人口减少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发达国家，也已感到将难以承受迅速增长的社会养老财政负担，而且人们也逐步认识到兴办养老机构、实行社会养老将割断被养老人与家人的“共存”联系及情感诉求互动空间，不利老人的身心健康，居家养老可缓解或避免这些矛盾，于是又导致“居家养老”模式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回归。

与此同时，少子高龄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家庭规模“小型化”、家庭结构“简单化”，已普遍造成家庭养老人力资源的不足及养老功能的弱化，使个人及家庭也同样难以承受“居家养老”的人力需求与经济能力的双重压力。少子高龄化及少子高龄社会的诸多矛盾，迫使人们不断探索新的养老模式，丰富养老模式的内涵和形式，形成养老及养老模式的多元化发展趋势。

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主要养老模式。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模式：

1.互助养老：是指老人与家庭外的其他人或同龄人，在自愿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相互扶持、相互照顾的模式。它具体包括老年人结伴而居的拼家养老、社区内成员相互照顾的社区互助养老等多种形式。在德国，有很多老年人共同购买一栋别墅，分户而居，由相对年轻的老人照顾高龄老人。还有的地方安排了一些大学生和独居老人合住，由大学生照顾老人。瑞士也建立了很多“结伴而居”的“室友之家”。

2.以房养老：是指将自己的产权房出售、抵押或者出租出去，以获取一定数额养老金或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它通过一定的金融机制或非金融机制，将房产蕴含的价值提前变现，从而为老年人提供养老资金来源。

3.旅游养老：国外很多老人退休后，喜欢到各地去旅游，体会不同的风土民情，从而在旅游过程中实现了养老。旅游机构也乐于为老年人服务，并通过与各地的养老机构合作，为老年人提供医、食、住、行、玩等一系列周到服务，使老人免除游玩中的后顾之忧。

4.候鸟式养老：是指老年人像候鸟一样随着季节和时令的变化而变换生活地点的养老方式。这种养老方式总能使老年人享受到最好的气候条件和最优美的生活环境。美国的佛罗里达，日本的福冈、北海道，韩国的济洲岛都是老年人相对集中的“迁徙”目的地。

5.异地养老：是遵循比较优势原理，利用移入地和移出地不同地域的房价、生活费用标准等的差异或利用环境、气候等条件的差别，以移居并适度集中方式养老。如美国就建立了大量的“退休新镇”、“退休新村”，吸引老人移居养老。

6.乡村田园养老：乡村的空气新鲜、生态环境优越、生活成本低廉。国外一些喜欢大自然的老年人退休后会选择在乡村的田园、牧场、小镇等地养老，每日养花弄草，颐养天年。

中国养老模式变迁：从单一走向多元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达水平和国民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比较尚存差距。但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的人口出生控制政策，以致使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步地迎来了少子高龄化。

同时，我国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具体国情，不仅使我国少子高龄化背景下的养老问题相对“超前”地显现出来，而且这一问题也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养老及养老模式的选择。

家庭养老，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首选的养老模式。随着城市化和人员社会流动的加快、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造成的少子化，导致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而且现代青年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变化，“事业人士”、“孝顺子女”两种角色的冲突和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居家养老”模式的排斥。

于是养老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部分老人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自主意识的增

强，兴办养老院等各种“社会养老”模式也逐步发展起来。

与居家养老相比较，“社会养老”模式可通过把老人集中到各种养老院“集体”养老，解决家庭养老人力资源不足的矛盾，但社会养老也有不少问题。社会养老需要持续的大量投资，没有足够的政府财政补贴几乎就难以为继。近些年来，我国在推进机构养老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国家或集体兴办、集资兴办、政府与非营利机构联办、民间资本兴办等几种投资经营模式，这些投资经营模式正在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已经建成运营的养老机构，存在一些管理和服务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目前我国养老要承受巨大的财政负担和人力资源需求的双重压力，这就要求我国既不能单纯实行“居家养老”，也不可大范围推广“社会养老”，而必须创新养老模式，走多元化养老之路。于是类似于“以房养老”、“异地养老”等养老新模式就应运而生，不断适应国人多样化的需求。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综合考虑我国养老的经济实力、人力资源、文化传统及亲情、空间、服务、需求等一些因素，我国应建立以“居家养老”模式为主、以“社会养老”模式为辅的“双轨”、“多元”养老体系。

“双轨”就是指“居家养老”和“社会养老”两种养老模式，“多元”就是指这两种基本养老模式投资主体、经营机制、服务内容等方面的多样化。

而且从世界范围看，90%以上的老人最终都是在家中安度晚年；日本的调查也表明在福利（养老）设施中养老的老年人因心情忧郁而死亡的比率高于居家老人。考虑“居家养老”的某些局限，所以还要坚持依托社区，以社区服务为保障，把社区养老服务作为居家养老的延伸和依托，建立居家—社区一体化养老服务系统，这样可近距离地保持家庭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的相互补充及互动援助，方便家人、社区与被养老人之间的照料看护，体现居家养老特征，发挥社区服务优势，提高养老服务质量。

总之，养老模式的相互结合、“双轨”并举，应作为我国未来构建养老体系的主要战略。这样不仅可以发挥多方面的养老优势，更可以满足养老，特别是被养老人的多样化需求。 **MOB**

养老也需经营

各国养老经验

发展养老事业，除了自己想办法，还可以从发达国家那里学习经验。



■ 日本: 鼓励老人发挥余热

众所周知，日本是老年人大国，其老龄化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堪称世界第一。据文部省调查，目前日本的老齡化率已经达到19%，到2025年预计将达到30%。为此，日本从政府到个人都非常重视老齡化问题。同时，整个社会也在积极发展养老事业，以满足越来越多的老人的要求。

PASONA公司为了配合日本老齡化社会的现状而推出了一项新业务，考虑到老齡化必将给社会造成很大负担，所以该公司通过在公司大楼内种植蔬菜和农作物，培训一些喜欢农业的老人，与地方政府联合起来，提供比较优惠的条件，让这些都市的退休老人回到农村务农，度过退休生活。在日本东京等大城市的老人大多是从地方农村出来的，所以，退休之后能够回到故乡，成为了一种很自然的愿望。因此，该公司推出的新业务很有“人气”。由于此举既可以解决农村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又能让退休老人自食其力，减少国家的财政负担，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其实，由于日本劳动力不足，老年人的“余热”已经再次得到社会的重视。东京有一家特别的“看护器材公司”。所谓特别就是指这个公司的职员年龄都在70岁以上，这也是该公司招收职员的条件。这家由70岁以上老人组成的公司主要开发适合老人用的各种看护器械。由于员工都是老年人，最懂得老年人的需求，所以开发出的商品很受欢迎，公司发展十分稳定。此外，很多大公司也推出退休人员再聘任制度，一种让老人发挥余热的风气正在形成。

除了为老年人提供从事社会活动的各种场所和机会，以减轻社会负担，日本政府还推出了“看护保险”，对那些生活不能自理或是行动不便、患有痴呆症的老人提供完善的服务。享受“看护保险”的老人可以到各种看护中心享受由专业人员提供的训练服务。前不久，日本修改了“看护保险”制度，从过去单纯提供完善的看护服务，向增进老人的身体机能、防治瘫痪方向转换。事实证明，这样做确实使很多行走不变的老人扔掉了拐杖，减少了需要看护的人数，效果十分显著。

除了就业和看护制度，日本的住房建筑业也针对老齡化社会的到来，推出了适合老人居住的住房，通过各种设计减少老年人的生活负担。像新型的“二世带”（父母和孩子同住）住宅就十分受欢迎。此外，日本的老齡公寓条件也越来越好，而且形式多样，老年人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和爱好来自由选择。此外，由于海外住房条件宽敞，而且物价又比日本便宜，选择在国外购房或者租房养老的日本人也越来越多。

■ 德国: 养老有四大支柱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现有人口约8300万，60岁以上老年人占人口的23%，而20岁以下的青年和儿童只占21%。到2050年，德国人口将从现在的8300万下降到7000多万，一半以上的人口将超过50岁，1/3的人口超过60岁。目前，德国的老齡化程度已处于世界前列。德国社会学家指出，生育率降低和人口老齡化给19世纪创建的养老保险体制带来极大冲击。德国的退休保险体制实行的是“转摊法”，就是用目前正在工作的一代人缴纳的退休保险金来支付退休人员的退休金。按照一般规律，最合理、有效的比例应该是每3个在职员工养活1个退休人员。但按现在的趋势，再过20年，100名在职员工就得养活78个退休者。

目前，德国老年人主要有5种养老方式：第一种是居家养老，老年人在家中居住，靠社会养老金度日。这种形式最普遍。

第二种是机构养老，这也是德国解决养老的主要手段，占5%—7%的比例。它由专门的养老机构包括福利院、养老院、托老所、老年公寓、临终关怀医院等对老人进行全方位的照顾。

第三种方式是社区养老，这也正在成为主流。这正好与德国政府开始实行的“就地老化”制度相吻合。这种办法强调对老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进行全面服务，且都在社区内进行，不脱离原有社区的人际关系。同时，为了解决老年护理人员的短缺问题，德国政府还实施了一项特殊政策——“储存时间”制度。公民年满18岁后，要利用公休日或节假日义务为老年公寓或老年病康复中心服务。参加老年看护的义务工作者可以累计服务时间，换取年老后自己享受他人自

己服务的时间。

第四种方式异地养老，目前也开始流行。老年人离开现有住宅，到外地居住养老，包括旅游养老、度假养老、回原居住地养老等。

第五种是“以房防老”，也深受欢迎。即为了养老而购买房子，然后出租给年轻人，利用房租来维持自己的退休生活。由于德国人支出的房租约占个人全部支出的1/4—1/3，因此通过出租房子养老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

在德国，法定男女退休年龄都是65岁，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子女必须赡养父母。但是，德国政府通过“四大支柱”保证了老年人养老的权益。

第一支柱是社会基本养老保障。根据法律，所有的工人和职员都要参加养老保险，养老保险费约占总收入的20%左右，由雇员和雇主各付一半，并从雇员的工资中扣除。职工养老保险公司在职工职业能力减弱后支付养老金和社会保险金。通常年满65岁者即可领取养老金。

第二支柱是私人养老金计划。员工在岗时，由雇员、企业主分别缴一部分钱。这些钱可以进行投资，获取的收益和本金都进入雇员的个人账户。个人更换工作时可以带走，但不允许提前支取。

第三支柱是个人储蓄。由个人平时存些养老钱，政府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第四支柱是援助计划。对老年人实施各种优惠政策，如医疗照顾计划，帮助支付保险外的所有医疗保健费用。此外还有住房基金、民间援助、针对老年人的监护法等。

■ 美国: 老年公寓什么都管

美国现有近3亿人口，仅少于中国和印度。近年来，许多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呈现负增长，但美国人口却一直在增加，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以及外来人口的高生育率造成的。美国也是较早进入老齡化社会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到2006年达到22%，也就是说，每5个美国人中就有1名退休老人。

美国有比较好的退休养老制度，为了解决养老问题，美国各级政府采取了多种方式，设立了不同的养老机构，主要是根据老人的身心健康程度和社交需求建立，而收费多的条件则会更好一些。美国养老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一是老人住在老年公寓里自己独立生活；二是住在有各种辅助设备的生活区；三是住在有人照料的退休社区，岁数再大一些的住在护理院；四是住在自己的家里。

以前，在80岁以上的美国老人中，有60%以上希望住养老院；而现在，越来越多的美国老人喜欢住在老年公寓里。一般的老年公寓具有多个单元房，只租给55岁以上的老年人。这样的公寓通常环境比较安静，没有孩子和年轻人的吵闹，还能结交新的老年朋友。

大一些的老年公寓有人管理，也称“退休社区”或“退休之家”。与老年公寓不同的地方是它除了租赁房屋外，还提供就餐、清扫房间、交通、社会活动等便利服务。典型的设施和服务还有：医务室、图书室、计算机室、健身房、洗衣房、紧急呼叫系统、外出购物、组织参加社会活动等。公寓内每周放一次电影，还提供2小时免费卫生服务，定时有人上门帮忙，其服务标准不低于4星级宾馆。不过，住在这样管吃、管住、管医、管玩的公寓里可不容易，每月收费都在3000美元以上。

如果老人需要24小时专门护理照料，没有轮椅、助行器或其他人的帮助就不能行走，不能自己完成日常生活的活，最好的选择就是到专业护理院去居住。有些患有老年痴呆症或慢性病的老人，就住在这类名叫专业护理院、康复之家的养老护理院内无忧地生活。

近年，美国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养老趋势，与上述传统养老方式的不同之处在于：几个经济条件比较优越的志同道合的朋友、生意人或亲属联合起来选一块地，自己或请人设计一个小小的养老社区，社区内有邮局、游泳池、网球场等服务设施。这种养老社区既能满足个人的要求，也能对社会和社区发展做出贡献。 **MC**



■张大千《爱痕湖》
1.08亿元
中国嘉德 2010年5月17日



■黄庭坚《砥柱铭》
4.37亿元
北京保利 2010年6月3日

ARTS AUCTION ENTERS "HUNDRED MILLION RMB ERA"

拍品的市场价值，正在按照其美术史与收藏史的价值被梳理。同时，大资本入场又加速了拍卖的证券化、金融化趋势。而金融资本的嗅觉一向灵敏、精准，他们无疑会首选在美术史上地位清晰而过硬的艺术珍品。

“亿元时代”的喧嚣

文_杜卡 责任编辑_杨紫婕

2010年6月，北京保利5周年春季拍卖会的中国古代书画夜场上，千余名藏家共同见证了世界纪录的诞生：北宋名家黄庭坚大字行楷书法手卷《砥柱铭》以4.37亿元成交，这不仅打破了2009年保利拍场诞生的1.69亿元的国内艺术品成交纪录，而且远远超过5年前的“元青花鬼谷下山大罐”在英国伦敦创下的2.3亿元中国艺术品成交所世界纪录。发展了17年的内地拍卖市场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中国艺术品的世界拍卖纪录。

除《砥柱铭》之外，此次还有2件作品价格过亿，美国回流的庞莱臣旧藏元代王蒙《秋山萧寺图》以1.37亿元成交，《石渠宝笈》著录的清代钱维城手卷代表作《雁荡图》以1.3亿元易手。而千万元以上的拍品更是多达15件，诸如6720万元的《元人出猎图》、5936万元的夏昶《湘江竹石图》等等。

“亿元时代”来势汹汹

如此澎湃的“亿元行情”，起始于2009年岁末。中国书画拍卖的最高价纪录在2009年连续3次被刷新。第一次是春拍时，清初画家八大山人作品《仿倪山水》在北京匡时以8400万元的成交价刷新中国嘉德2007年创下的明代画家仇英《赤壁图》7952万元的纪录。第二次是中贸圣佳秋季拍卖推出的乾隆时期画家徐扬的纪实作品《平定西域献俘礼图》，以1.344亿元刷新匡时的纪录。接着，北京保利在“尤伦斯夫妇藏重要中国书画”专场中又以明代画家吴彬《十八应真图》1.69亿元刷新中贸的纪录。

不仅单价屡屡冲高，书画板块总体的上拍和成交数量也都非常可观。根据雅昌艺术市场监测中心的统计，2009年秋季，中国艺术品拍卖49%的市场份额来源于中国书画板块的强力支撑。高价拍品前100位中，中国书画有50件入围（瓷杂、油画等其它艺术门类的拍品占50件），霸占半壁江山。这50件书画的总成交额为17.4 亿元。其中古代书画的33件作品成交额高达13.3 亿元，近现代15件，当代书画2件。

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总经理董国强透露说：“因为国外藏家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巨大，所以把一些多年不忍心转让的古代经典作品拿到中国大陆拍卖（比如，八大山人的《仿倪山水》是著名美籍华人大藏家王季迁的旧藏；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和曾巩的《局事帖》则是比利时尤伦斯夫妇旧藏。）。这些珍品，对有志于成为收藏家的人来说，可谓必争之物。几个人都这样志在必得，于是造就了拍场上前所未有的高价。”董国强所说的“几个人”，在北京保利拍卖公司董事赵旭的口中

得以证实，“4位顶级华人买家，他们分别是上海天衡拍卖公司董事长陈郁、上海新理益公司董事长刘益谦、台湾著名藏家林百里，还有一位是不知其名的山西大买家。众多天价的出现，归功于他们的争抢。”可以说，这一波亿元行情的形成，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竞价的结果。经过近20年的逐步回流，书画板块的定价权已基本回到中国藏家的手中。

相比之下，以前的购买行为则明显保守、审慎和被动许多。譬如2003年上海博物馆购回《北宋淳化阁帖最善本》的例子。美籍犹太古董商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的一次艺术品拍卖会上以30万美元购得《淳化阁帖》。10多年后，经多轮谈判，安思远终于愿意以450万美元的价格将之转让给上海博物馆。面对巨大价差，

上海博物馆出版了6本专著论证其合法性及价格合理性。专业人士除了论述回购决策中的文化必要性外，还要说服主管官员和纳税人为何出这么多钱。然而，今天我们的收藏家可以不太顾忌市场以前是否有过这种成交价格，以及往后有没有人接盘。他们可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出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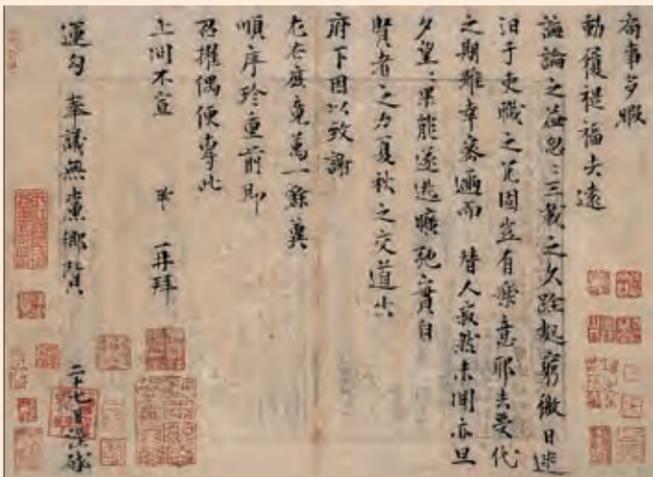
这也就不难解释，一些书画精品前些年估价不高仍在海外遭流拍，近期却频频以高价在国内成交。如上海收藏家、澄元楼主人颜明谈到那件萧云从《青山高隐图》，前两年在伦敦上拍，估价折合人民币270万元都未成交。2009年秋拍中却在中国嘉德以人民币6720元顺利售出。这背后实为艺术品价值的再发现。经过从2003年秋拍到2008年春拍的上一轮起伏周期，中国的书画市场已经相对

成熟。拍品的市场价值，正在按照其美术史与收藏史的价值被梳理。同时，大资本入场又加速了拍卖的证券化、金融化趋势。而金融资本的嗅觉一向灵敏、精准，他们无疑会首选在美术史上地位清晰而过硬的艺术珍品。

金融资本积极介入

的确，2000年以来，全球艺术品价格普遍上涨的重要推力便是证券等金融产品丰厚的财富效应。目前，这轮以书画为首的艺术品价格高涨，自然也有金融资本流动性十分充足的因素。

中国台湾收藏家、寒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定乾简洁明了地指出：“亿元时代后，艺术品与国家综合实力息息相关。艺术品、股市、楼市和整体经济构成了金融资本市场，



■曾巩《局事帖》
1.09亿元
北京保利 2009年11月12日

艺术品也是金融商品和投资工具了。”这一属性的变化，剧烈地动摇了原有的判断标准。例如《朱熹、张景修等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估价150万元，成交价过亿元。所有原来的价格判断完全落到市场后面了，这不单是我们一家。”中国嘉德书画部主管胡妍妍继续说：“我们观察到超过心理价位很多后，竞投者并未电话请示，或与身边朋友商量，买家比我们的心理准备更充分。现今，我们站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要以全新的估价眼光审视拍品。”对金融市场和艺术品市场的联动趋势，艺术评论家王春元谈到：“对艺术品本身的财富性的过多关注，会使高端艺术品越来越成为投资对象。其鉴赏性将成为投资的一种辅助行为或者是判断标准。”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亦有同感：“这不是我向往的，但却是事实。金融资本的介入或者是金融资本对这个市场进行彻底的改造都有可能。”

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龚继遂近年来一

直研究高端艺术品的价格构成，他的解析格外透彻。“艺术品价格猛涨的背后是收藏群落的变化，是收藏人士财富构成的变化，是收藏动机和收藏功能的变化。”他预言：“在这一波大潮后，主要会有3种购买者进入市场，即出于爱好或将艺术品作为资产配置而购买的高端资产人士，保险公司、银行等机构投资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投资基金。”随着金融资本加快进入艺术品市场，过去的散户行为渐少，资本运作行为大大增加，这必将严重冲击传统的收藏生态。

且看，艺术品之所以形成高价，是以其稀缺性为前提的。而所谓稀缺性从表面说是指市场流动量有限，实际上是因为大部分高端艺术品的“不”流通性。这些“真、精、稀”的艺术品往往是藏家企业形象和个人社会地位的象征，是购藏者长期资产配置的一部分。“若投资基金进场，并对高端艺术品交易形成垄断，而投资基金又要求限期套现乃至短期套现，这就颠覆了其‘不’流通性。另外，

金融资本进来后，其话语权、议价能力和出价方式都还不确定，由此形成的艺术市场新格局也有其不确定性。”龚继遂从学者的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除了资本的因素外，他还观察到“现在的收藏已不是单纯应对美术史上的作品出一个被动的兑价，而是购买行为本身就立即可产生潜在的增值。1.69亿元购买吴彬《十八应真图》的行为引起了社会轰动，这对刘益谦先生个人知名度和公司品牌起到了极好的广告宣传效果。如何善用藏品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是今后创造藏品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中国传统的所谓‘购而藏之’，一定要向‘购而展之’过渡。”这方面，非常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时保利集团耗资3000多万港币购藏3个圆明园兽首。保利通过向公众有力介绍和宣传藏品，把社会效应做得风生水起，自然而然扩大了整体知名度和品牌影响力，从而有力地带动了集团业务中文化产业及其他行业的深远发展。

中国书画拍卖的三个“时代”

资深艺术评论家王春元梳理了16年来中国书画拍卖的历程，并将其分为“行情”、“市场”和“价值”3个阶段。1994年—2002年是一个“行情时代”。进场的买家们大多数并不了解作品的价格应该是多少。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模糊行情，通过拍卖的价格，一点点变得清晰。自称拍卖场“老兵”的王定乾回忆20年前的竞标。那是1989年，他在纽约佳士得以187万美元竞得《元人秋猎图》，这一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至2000年4月30日才被刷新：香港佳士得以1764.5万港元（约226.5万美元）成交了清朝宫廷画家郎世宁的《莘野鸣秋》。《石渠宝笈》著录的古代书画10年才会被超拍卖纪录，让人感慨。

2003年—2008年则进入到“市场时代”。尤其是2003年“非典”后的市场井喷，国内收藏爱好者扩容至上千万的人群，市场板块和各板块的收藏群体在不断形成。在这一轮书画拍卖的行情，蜂拥入市的新买家以浙商为主，瞄准的是“海派”与中小名气画家的作品。这些书画当时出现了普遍上涨，而遇到熊市时又出现了大面积下跌。

2009年以后的艺术市场呈现出全新的面貌。之前频繁流通、击鼓传花式的炒作慢慢偃旗息鼓。买家们逐渐成熟起来，开始关注每件拍品的艺术史位置和内在艺术价值，基本脱离了行情和市场的干扰，也就是说进入到“价值时代”。大买家关注的是，什么样的艺术品才能构成财富。于是，经典的、国宝级的拍品才能创造出之前想都不敢想的天价。对于这个时期，颜明说，现在入市的主要是大资金套现的山西煤老板。他们进入拍卖场都有专家策划，专买高价拍品，结果一下子打开了市场空间。同时，在市场摸爬滚打十多年的老藏家，也比以往出手更坚决，其代表是林百里以及刘益谦等。



TIPS:



■王蒙《秋山萧寺图》
1.37亿元
北京保利 2010年6月3日

识物知天

书画进入亿元时代，大家对于价格的关注远超过对于作品本身的了解。可是比照历史，真正的收藏乃是对历史与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藏家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地细细把玩中，感受艺术品向外渗透的那种沉着自定的力量，在与同道的相互品评中享受那份怡然会意的恬静趣味，最终成就的是识物知天的心性。站高些来说，这甚至涉及一个人、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国家与其祖先的关系，涉及个人与大的共同体的价值认同。正如收藏家马未都所描述的，“在古代的文物与当代的

收藏者之间，应该有一种互动与对话，从那些饱含着历史信息的藏品中，解读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为民族文化的每一阶段留下清晰的印记。”不仅如此，能达高远境界的大收藏家，还要将所得之宝传给后世不至埋没。

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便是近代史上留有佳名的大藏家。他收藏字画以眼力、魄力过人而闻名，自认“三十以后嗜书画成癖，见名迹巨制虽节用举债犹事收蓄，人或誉笑焉，不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用现大洋4万块买下西晋陆机的《平复帖》，又

倾家荡产凑足黄金240两购得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一件流传最早的法帖墨迹，一卷存世最古的青绿山水，而后都被张伯驹无偿捐赠给北京故宫博物院。4万块大洋是多少？有文章记载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的每月收入为400多块大洋，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4万多元。那么，仅从表面数字折算，70年前张伯驹为购不足一尺长的《平复帖》用去400多万元，这真是今天的普通人都不能想象的天价。可见，对于张伯驹来说，字画必定不只是千金万银可以衡量的。MCE